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8)

多维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非
外
借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8)

多维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5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第8辑)

ISBN 978-7-5325-9208-1

I. ①多… II. ①复… ②复…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9870 号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8)

多维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75 插页 5 字数 300,00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208-1

K·2644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8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立诚 朱荫贵 吴景平 张济顺 张晖明
陈思和 林尚立 金光耀 金冲及 姜义华
顾云深 章 清 熊月之 戴鞍钢

执行编辑 韩承桦 张仲民

“经学”“典籍”紧密联结在一起。葛兆光就曾以 20 世纪 40、50 年代侯外庐(1903—1987)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为例,说明该书所言之“思想”,是通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作为其历史面貌。^③而这很可能是受学案写作传统影响所致,此种书写逻辑所展示的“思想世界”,只会是一间陈列着各方思想家照片的博物馆,向读者细数这些天才的生平故事。这样的写作模式,便会将“思想史”简化为以精英和经典为主体,仅能显现思想表层的历史。^④

其次,受到欧美史学浪潮的淘洗,“社会”“文化”范畴和“思想”生成与运作之历史脉络的互动广受重视,从而开拓了许多过去未曾入眼的课题。最明显的趋势,莫过于强调思想生产的“社会性”以及“文化意涵”。这推导出一种想法,即认为“思想”并不是先验存在,亦非具有某种“本质”而静止的;它的成形、变化、流通和运作其实是与人们活动的日常生活世界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就如史家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所言,思想史已经不再只是“脖子以上的历史”。^⑤西方思想史研究多元的发展趋势,让我们意识到还能从人们阅读的行为和感官认知中,在书籍/文本印刷、消费和传播的过程里,在观念、知识网络赖以生存的具体世界中,发现“思想”的各种踪影。于是,研究者对“思想”的理解,遂得脱离表层的认识。随着这个深挖的过程,“思想”或“观念”原应有的“分层”以及各“层次”间的竞合、互动,逐渐被注意到。^⑥当我们能以“分层次”的视野来观察思想于历史世界中的活动,过去不被重视的议题和史料,就可能从沾满灰尘的角落,重新被置于聚光灯下。

各位现在看到的论文集,可谓是受益于上述研究趋向转变的产物。这本论文集的特点,大抵展现了研究者“分层”的视野,拆解“大写”的思想和观念,从社会的角度观察思想和学术的形成、流变与再生产。这交织出三个近年备受关注的思想史课题:思

想/观念流动、运作的载体/媒介,特定政治、社会环境下的思想文化场景,传统知识和人物的现代转型。

首先,思想、观念的载体和媒介问题,呼应了学界对新词汇、新概念的关注。词汇、语言是储存复杂观念、思想的容器,人们则用其作为表意的工具。书中四篇文章,讨论晚清民国以来的“游历”“意识”和“宗教”等问题,以语词作为观察面,追索新观念成形、发展的历史过程。蔡明纯的《以九部清代经世文编看“游历”认识的思想转变》,以“经世文编”来考察单一概念在晚清时期的变化。蔡文指出,“游历”观念内涵的转变,不单是人们行为实践的改换,更反映士子对于“天下”“洋务”和“国事”内涵之理解的改变。顾少华的文章则从阅读史的视角考察了沙俄时代彼得大帝在晚清中国的引介和接受的历史,以及其在晚清社会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与作用。韩承桦的文章《语言、知识与政治文化:“意识”的概念史(1890—1940)》,追索“意识”如何从一个国人闻所未闻的“新名词”,转为学术和政治场域的“关键词”。这段历史进程揭橥了语言如何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及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徐佳贵《论夏曾佑的“宗教”观》一文则利用“宗教”这个典型例子,说明词汇在时代转型阶段,如何同时容纳新、旧观念。“宗教”观念的演变轨迹,更呈显近代思想史的关键概念——“儒教”“孔教”,其内涵是层叠交错、相互影响的。这类新名词、新观念的相关讨论,揭开了隐藏在单数大写历史叙事底下的片段和细节。

对精英思想家的研究,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张仲民的《言行之间——严复与公立复旦公学》一文运用大量材料,将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言论还原到历史现场,非常细致地考证与勾画了严复参与清末上海公立复旦公学的情况,以及由此展示出的严复言行之间的差异,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严复为人及其思想情况。裘陈江《民国元年孔教会上海发起史事钩沉》一文重新钩

沉孔教会草创时期的历史,尝试通过历史场景的追索和还原,反省过往被忽略的细节及其历史意涵。裘文指出,孔教会的成立反映了在阵阵“废孔”声浪外,仍可听闻维护传统的声言,且这是与当时象征“文明”“西化”等现代性生活因素,譬如报刊这类传播媒体和传教士活动交织在一起。相较于裘文描写“传统”如何借着“现代”因素延续,翁稷安《革命即教育,教育即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则呈现了属于传统范畴的道德教条,如何转化为一套以现代化、科学化原则改善日常生活乃至社会、政治行为的规训方式:三民主义。环绕着国家机器如何操作单一意识形态的讨论,翁文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主义化”浪潮,由上至下遍及人们琐细的日常活动,并在“革命”旗帜下,将传统道德、科学理性精神和现代政治原理有机结合在一起。凡此可见,研究者只有进入当时的政治、社会场域,“心通意会”,才能适切考虑思想文化变动的原因、状态及可能的影响,而这也能促使我们思考特定历史场景的特性及意义之所在。

人物或知识/思想范畴,也是我们重省历史场景复杂性的某个侧面。本书收录的两篇文章体现出近代知识人于思想转型时代的多种足迹与身影。丘文豪《“自立”的焦虑:1927年前顾颉刚的人生追求与关怀》一文以顾颉刚(1893—1980)为例,通过挖掘顾氏的个性及人生追求、关怀,结合其于私领域与公领域的行为、想法,反省过往仅从公众面向来评估历史人物的做法。读者将看到一个同“五四”新文化浪潮、古史辨运动中执旗呐喊之身影相去甚远、更复杂的顾颉刚。王刚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史料学建设刍议》则从现代学术研究建立的角度,评估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的内涵、意义及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此文提醒我们,应该进一步反省新文化运动对于知识、思想文化造成的,仅以新、旧/现代、传统此种单一且二元对立的评价方式。这两篇文章除以深描细写的

工夫勾勒出个人多面的生活/历史经验外,更说明历史人物的“私领域”确可作为通往历史场景的另扇窗口。

近年来,新材料的大量出现、新方法的引入,以及新议题的不断提出,极大地拓宽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畴。史家不再只是待在博物馆里摹写思想家群像,而是如旅人般出入相异的时空环境,寻觅人物、事件和思想交织互动的痕迹。历史的发展变化就好比海浪,过往的思想史研究仅注意到第一道浪冲打至岸上的景象,忽略了海浪其实是层层堆叠而至,且褪去的速度很快;往往在首道浪消退时,第二、三、四等后续大小、强度不一的波浪又冲抵至岸边。我们不应只注意到表层最明显、最活跃的思想及论述,还需观察在不同时间点出现,力道、程度相异的思潮,甚如浪花顶端泡沫般的小众型观念,厘清彼此间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当“大叙事”框架逐渐析离时,不同历史层“之间”所展现的纷繁多样,正值史家探询其间奥妙。于是,在肯定了“何处没有思想”的论调后,我们该前往何方,如何发掘、辨析这些思想、观念、知识、言语、论述的身影及可能之影响,就是另一件迫切的工作。

编者识

① 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pp. 191–218. 当时的论调即为,此类缺憾就当由社会史家来补足。

② 这类研究反省,先出于欧美学界的手笔。每次的检讨都促使史家改换探究“思想”“观念”的方法,从而催生了诸如“心态史”“书籍、阅读文化史”“新文化史”“概念史”“知识史”等分支。史家葛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在一篇为《观念史期刊》(*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庆生”所写的文章中,对这段变化有较清楚的描写,且也指出思想史抑或观念史研究原应具

备的开放性。Anthony Grafton, “The History of Ideas: Precept and Practice, 1950–2000 and Beyond”,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 Vol. 67, No. 1 (Jan., 2006), pp. 1–32.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④ 同上书,第9—13页。

⑤ David Armitage, “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é eds.,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33.

⑥ 王汎森陆续在几篇文章中触及了思想史研究的“层次”问题。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兼论思想史的层次》,收入氏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7年版,第393—407、19—52页。

目 录

导言	1
----------	---

· 观念与社会 ·

“二重证据法”与古史史料学建设刍议	王 刚 1
-------------------------	-------

从九部清代经世文编看“游历”认识的思想

转变	蔡明纯 37
----------	--------

晚清中国的“彼得兴俄”叙事及其演变	顾少华 79
-------------------------	--------

语言、知识与政治文化：“意识”的概念史(1890—

1940)	韩承桦 118
-------------	---------

革命即教育,教育即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

教育政策	翁稷安 181
------------	---------

· 人物和时代 ·

言行之间

——严复与公立复旦公学	张仲民 227
-------------------	---------

论夏曾佑的“宗教”观	徐佳贵 291
------------------	---------

民国元年孔教会上海发起史事钩沉	裘陈江 313
-----------------------	---------

“自立”的焦虑：1927年前顾颉刚的人生追求与

关怀 丘文豪 352

· 书评 ·

殖民展示视野下的博览会

——读吕绍理《展示台湾》 夏 静 380

· 观念与社会 ·

“二重证据法”与 古史史料学建设刍议

王 刚

摘要：“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史料危机”刺激下的一种学术应对，是对现代“疑古”的纠偏，它使得古史史料由破坏走向了建设。当前，古史史料学的建设要步入正确轨道，就应以“二重证据法”为学术起点，在接续的过程中，消除似是而非的误判，建立正确的学术认知，秉持事实优先的原则，培养研究力，在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以博返约”，从增量到定性，建构新的分析系统，实现方法与学科的互通，从而为“古史重建”提供坚强的史料基础和学术助力。

关键词：“二重证据法”，古史史料学，王国维，“古史重建”

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从“古史重建”与 “二重证据法”的再审视说起

1992年,李学勤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指出,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为“重写”中国上古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由此,他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此后,随着《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等重要著述的结集出版,^①此一问题在学界引起了巨大而持续的反响。从特定意义来看,李先生及其学人群所做的工作渊源有自,实质上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古史重建”的延续与发展,在学术范式上则接续着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职是之故,他在相关论述中多次致意王国维及其学术,并一再强调:“我们依据出土文献来重建古史,应当以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作为范例。”^②

习史者皆知,所谓的“古史重建”,时间范围在早期中国,指的是上古史的重建。^③这一时段的基本事实,在近代学术眼光下,呈现出种种不确定性,难以构成信史。20世纪20年代,在胡适学风及“整理国故”运动等的影响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疑古”为号召,认为先秦以上的古史记载主要是后世“层累”而成的传说与神话。他们号召,古史研究需要“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并宣称“东周以上无信史”。^④“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对于近代史学发展的革命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当“疑古”派以“去伪”为旨归时,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破坏”,而不是“建设”。就研究视角来看,过于信古,难得其真,但过于疑古又何尝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呢?由此,在“古史重建”的进程中,以“二重证据法”来存古史之真的王国维及其学术,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选项。

回顾历史,“古史重建”背景下的“疑古”派,以及王国维“二重

证据法”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是时势和新材料结合的产物,并成为了古史研究从传统进入近现代阶段的表征。所谓“时势”,简言之,是时代所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随着“五四”以来重估价值的展开,以往的“信古”立场遭到抛弃,传统经书被质疑,不再成为可信的论证材料,“疑古”作为现代学术的应有精神和方法应运而生。关于“疑古”派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大多关注的是它的现代意识和科学精神,但就史学研究的要素或方法而言,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侧面,那就是史料学方向上的开掘。所以余英时在评述顾颉刚学术时,有这样的判定:“恰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⑤但问题是,晚清民初又是一个新材料的发现时代,它为学术研究带来的冲击和助力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学术走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古史重建”中必不可少的另一大支撑,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于是在时势之下借力于此,应运而生。有学者指出,王国维时代有着“前人所未见到的新材料,同时面临历史观的巨大变革和冲击,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变革而重建古史的一种努力和尝试”。^⑥

比较而言,顾颉刚所代表的疑古派仅就古书论古书,是一种纸上材料的“辨伪”,而王国维则开始利用新出土材料来存真,并以其学术实践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如学界所熟知的甲骨证史,廓清迷雾,贡献良多。很显然,王国维在史料的扩展和考订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一批批学者在其方法影响下,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下,很自然地,当李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及“古史重建”时,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接续和发展,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建立“二重证据的新典范”,^⑦成为学术旨趣所在。

学术研究需要接续和继承传统,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不言而喻。但问题是,当李学勤及其学人群再一次提出“古史重建”时,是伴

随着“走出疑古时代”的反思而来。然而,这一反思不仅至今未获学界普遍共识,反倒是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学术裂缝。具体说来,在这一进程中,学界出现了一种将“疑古”与“走出疑古”相对立的做法,甚至有“短兵相接,狭路相逢”之谓。^⑧激烈的言辞下,容或有一时的意气之见,但指向性却是十分明显的:直接将新时代的“走出疑古”以及“古史重建”,与前“疑古”时代的学术画上了等号。再进一步言之,似乎只要反对当年“疑古”派的某些看法,不认同文献记载是“伪书的结晶”,都有被划入“信古”阵营的可能。虽然李氏早已申明:“疑古思潮是进步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它也有不足之处。我们说‘走出疑古时代’,就是要克服它的不足之处,而不是回到疑古派所说的信古时代。”^⑨但遗憾的是,由王国维学术发展而来的新范式,还是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信”与“疑”,甚至“前进”与“倒退”的二元对立思维中。

关于这一问题,牵扯面广,本文不作无谓的展开。仅就本论题出发,可以看到,一时风尚之下,有学者是这样来再审视“二重证据法”的:

这种具有严重逻辑错误的“二重证据法”,后更被滥用,形成一种将考古学的发现装入古籍记载框架的错误倾向,对历史学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其一是充当了阻断“古史辨”史学革命途径的主要理念,其二是成为战国先秦史研究中许多谬误观点形成的枢纽。^⑩

长期以来,对于王国维的学术水准及“二重证据法”,早有定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这样评说:“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⑪这不是一时之私言,而是长期公认的学术事实。

总的来看,王氏的具体观点容或有商,但其所代表的学问及范式早已成为了巍峨的丰碑。故而,前引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恶评,几乎是颠覆性的论说。作为学术史上从未有之的现象,它出现于今日,乃拜时代所赐。简单地说,当“疑古”或古史辨派成为“革命”及“前进”的代名词时,“二重证据法”就被改造成了“信古守旧”的代表。所以,我们看到,受此观点和风气影响,有人不假思索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读王先生的原文,不仅有矛盾与逻辑问题,甚至有些‘信古守旧’的意味。”^⑫从特定视角来看,与其说它们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贬损,还不如说是对当下超越“疑古”,接续王国维而发泄的不满。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笔者以为,要厘清这些问题,就必须在当前“古史重建”的背景下,放下门户之见,彻底回归到学术本质上来。从学术研究的事实出发,既要去认真审查“二重证据法”在今日所具有的意义及适用性,更要切实考察王国维提出这一方法的历史维度和内涵所在,并由此真正理解顾、王之间的学术纠葛及意义,如此,对这一学术传统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才可能有全面、准确的判定。而从严格的史学研究角度来看,顾、王的学术趋向及今日所衍生的种种意见,一个重要的内核所在,就是古史史料学。^⑬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下面,笔者就主要从古史史料学建设这一视角出发,在传统和现实的学术审视中,展开具体的论述。

二、史料危机与建设:“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及相关问题

1925年,王国维在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的《古史新证》课程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核心观点如下: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其(过于疑古)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⑭

细绎文本,在这一论述中,有一个鲜明的指向,那就是史料。质言之,“二重证据法”的一个重要目标,乃是发掘和确立可信的古史史料,下面具体论之。

(一) “疑古”下的“史料危机”与“二重证据法”的应对

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的出台,固然有着学术上进步的意义,但矫枉过正的学思路径也带来了严重问题——史料危机,它直接刺激了“二重证据法”的提出。^⑮

查考中国学术史的发展,“疑古”传统早已有之,严格地说,近代之前的中国人全盘“信古”,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顾氏的“疑古”就有着古代的传统,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不同的是,此前所怀疑的是具体事实与材料,但近现代疑古派审查史料的最终结果,是对整个古史系统在文献上进行全盘否决,这实为前所未有的学术大裂变。当顾颉刚所代表的疑古派主张“东周以上无信史”时,表现在面上的是“将上古信史击成碎片”,^⑯贯穿于始终的,则是整个上古文献的全面坍塌。对于初入近现代学术阶段的中国古